

#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重建

刘 少 杰

在后工业社会基础上,后现代主义者对以结构论为中心、以理性化为实质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展示了批判;反后现代主义者站在维护现代性的立场上,试图重建西方现代化理论。二者的共同点是强调人际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未现代化民族应从他们的理论思考中有所借鉴,应当确立把人与自然同人与人两种社会基本关系系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作出发展自己的新选择。

作者:刘少杰,男,1953年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一、摧毁结构中心论

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不仅以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开出了修复西方文明的处方,而且还对伴随后工业社会来临而愈演愈烈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批评。然而,贝尔不但未能平息后现代主义的汹涌思潮,反而为后现代主义进攻西方现代化理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作为文艺思潮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最初并未清楚地向人们昭示出它们所立足的现实基础,各种反传统、反文化的奇异形式,往往使人们迷惑不解。而当贝尔从社会学的宽阔视野对西方社会转型做了总体透视后,人们却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流行的现实根据,它不仅是艺术家们的标新立异,而且也是当代人对现存社会转型的复杂体会。

丹尼尔·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转型,而这场社会转型的根本之处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同自然的关系,社会的中心任务是人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后工业社会因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由人同自然的关系转为人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中心任务也转为调解人际矛盾、寻求社会和谐;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丹尼尔·贝尔的这些论断,既为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实基础,也为后现代主义进攻西方现代化理论增强了冲力。于是,在艺术家们首先举起的旗帜下,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伦理学家……,他们不像贝尔那样为现实的变化而忧心忡忡,而是凭依变化的现实,向现代主义发起了全面冲击。

后现代主义最激进的表现形式是德里达(J·Derrida, 1930—)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德里达、福柯(M·Foucault, 1926—1984)、巴尔特(R·Barthes, 1915—1980)、阿多尔诺(T·W·Adorno, 1903—1969)、利奥塔德等人的理论主旨就是要消解和摧毁那个由孔德、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苦心孤诣地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理论。在他们看来,社会原本没有结构,它不过是在自然科学成就的诱惑下,按主观与客观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为了控制充满无限偶然性和变动性的社会而编造出来的概念模式。

针对结构功能主义,德里达提出了“分延”(difference)概念。在德里达看来,不仅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交流,而且现实的社会行动过程,都是一种不断离异、区分、扩散、延迟的变动不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能把各种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导性中心,也没有由主导中心制约而成的稳定联系,结构与系统等概念不过是人们面对无限变幻的异质世界产生困惑与恐惧时,为自己找到的观念寄托和心理支撑。实证主义者们试图以社会结构的系统性、规律性运动来解释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以为凭此可以为人们找到一条自由幸福之路。其实,实证主义者们在做一场与基督教一样的理想之梦。基督教在心理表象中把人们引向虚幻的天国,让人们屈服于神权的统治;实证主义在社会现象中把人们引入确定的系统,让人们服从政权的统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二者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都具有以普遍性制约特殊性、以稳定性规范变动性、以观念和原则约束个性自由的共同性,因此,实证主义的结构系统论是概念化的宗教信条,是逻辑化的宗教观念,它们都只能是人类渴望自由幸福之理想的异化。

阿多尔诺论述的更为明确,他认为这个已被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支离得飘零破碎的世界,根本谈不到什么结构与系统,那些规范的概念和典型化的结构模式,既没有现实基础也没真实意义。受勋伯格(A. Schoenberg, 1874—1951)“无调音乐”启发,他以“无调哲学”来说明社会现实。音乐是时代心声的表达。古典音乐的整齐旋律和激昂情绪,表达了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目标明确、勇于开拓、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勋伯格认为,那个热烈进取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彷徨徘徊、萎靡不振的时代,古典音乐也因现实基础的丧失再也引不起人们的趣味情感和心理共鸣。他创造了一种没有主旋律、没有规则节奏的“无调音乐”,试图以此来表达现代西方社会杂乱无序的现状。阿多尔诺对此非常赞赏,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确如勋伯格“无调音乐”所表达的那样,既没有人们共同认可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尺度,也没有把社会维系起来的中心权威和整合纽带,疏远、隔离、盲目、消极是现代西方人的精神现状,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那种具有明确中心范畴、严密逻辑体系的古典哲学,如同古典音乐一样,再也无法理解和表达西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破碎、零乱、无规则的世界,只能用无中心、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阿多尔诺称之为没有主基调的哲学。

社会虽然失去了中心,没有了结构,但是长期在传统思维方式束缚下的西方人,他们心中还在迷恋着某种中心,幻想着某种结构,这是文化的荒诞、现实的悲哀。素以教化人生、解除时弊为己任的西方学者,向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发起了冲击。德里达认为,仅仅指出社会无中心、非结构还不够,还必须摧毁存留在人们心中的中心,消解镶嵌在人们头脑中的结构。中心与结构本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理解,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或者说是人们阅读时对社会的一种赋予。像尼采要重新估价人生一样,德里达提出要重新阅读世界。阅读不是被动的反映,阅读是创造、是参与,重新阅读的首要任务是消解自己头脑中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然后再去消解文本中的系统与结构。因此,重新阅读首先是现代人的自我解放,是思维方式的革命。

## 二、解构社会理性化

摒弃二元论和本体论来重新阅读社会,德里达发现社会不过是一场“无底棋盘上的游戏”,这里既找不到支撑社会的本体,也找不到规矩人生的结构与秩序,生存就是游戏,游戏就是意

义。利奥塔德把当代社会生活看成一场语言游戏，人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以口语交流展开着生命形式，而且在工作与生产中也时时为处理电脑语言、信息符号而支付自己的精力。语言就是存在，就是生活。利奥塔德把语言看作生活的表达和象征，语言可以呈现意义、沟通理解，但不能把握本体、描述规律，那些被认为表征本体与规律的语言不过是幻觉的呓语。语言所能做到的，就像它本身存在的那样，是以不确定性的形式表达着不确定的生活。

转向语言，在日常语言中理解社会与生活，是当代社会学同当代哲学、美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语言中被理解的社会，用弗·杰姆逊的话来说，是一个“无深度的平面社会”。杰姆逊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不再为“实质”与“本质”之类的问题去烦恼，也不再用语言去探求客观真实与终极价值。因此，杰姆逊主张削平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深度模式”。所谓“深度模式”是指黑格尔在现象之下寻求本质的辩证法模式，弗洛伊德区分表层和深层心理结构的精神分析模式，存在主义关于本真与异化的生存论模式，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关于能指与所指的模式。在杰姆逊看来，这种把整体存在做二元划分，试图寻求某种本质的思维模式或理论模式，不仅无法理解真实存在的现实，还会给人们设置屏障、误导人生。削平深度模式，就是要消解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本真与异化、能指与所指的的对立，从对玄奥本体思考返回对生活世界的体验，从对抽象概念逻辑的堆砌转向对经验世界的描述。

走向无深度的生活平面，这使一向以透视深层本质为己任的理性受到冷落。其实，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近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不止是被冷落，而是被解构与摧毁。法国后现代社会学家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一书中指出，欧洲近现代以来一直在迷恋着理性化，以为现实理性化了就会有秩序地平稳发展。然而，事与愿违，理性化不仅不能给欧洲文明带来积极作用，相反会阻碍欧洲的进步，因为欧洲近代文化中的理性是病态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当理性按照实证科学原则表现自己，并借助自然科学的成就而跃居欧洲文化统治地位时，它正以其冷静的形式施展着残暴的疯狂。

如果理性是疯狂，那么以理性化为实质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岂不等于疯狂化了吗？在福柯等人看来，把西方社会推入科层制铁牢笼的现代化确实已近疯狂的程度。现代化的疯狂不是使人和社会像疯子一样不受拘束地言说和行走，而是像疯子一样对人和进行规范与控制。在现代化理论家所设计的各种制度体系和结构模式中，否定人与社会异质多样性，武断地把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普遍化为世界各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模仿、学习、依附是不发达国家发展自己的基本途径。这些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战略，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以科学理性为根据的西方文化沙文主义。面对学习和模仿并未缩小东西方民族贫富差距，尤其是面对工业化、理性化给西方社会造成的种种病态这些现实，人们应当迷途知返。进一步说，西方人应当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东方人则应在看到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看到西方发展道路中的迷失与癫狂，应当在自己的传统与现实中寻找发展自己的根据与模式，或者说确立本民族发展的理性原则和理性化方式。

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来看，发展方式和发展传统多元论的根据也清楚可见。追求真、善、美三种不同境界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是有自己现实基础和理性根据的不同理解方式和活动方式。科学、宗教、伦理和文学艺术，相对于它们各自追求的境界和价值目标而言，它们都是合理的，而把它们的原则普遍化，或者强加于其他文化形式时，它就由合理变为不合理。人们一般认为西方近现代社会是科学理智型的，东方传统社会是宗教伦理型的，实质上是从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差异上看到了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说西方近现代社会是科学理智型

的,是说科学理性在文化中占了统治地位,其他文化形式都受制于科学理性;说东方传统社会是宗教伦理型的,是说宗教理想和伦理规范在文化中占了统治地位,科学的发展受制于宗教伦理。从功利主义原则看,科学理智型的社会模式固然有其宗教伦理型社会不可与之相比的长处。但是,人不能仅求功利而无理想和规范,并且,如果东方人也像近现代西方人急功尽利,地球的环境资源也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许多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功利主义发展模式未必合理,东方伦理主义发展模式未必不合理,伦理经济学、伦理生态学等边缘学科的建立,从理论上表现出西方人正在试图用东方宗教伦理修改西方社会发展观念。

### 三、重建现代化理论

后工业社会来临和后现代主义的激烈冲击,并未使寻求理性化的现代化理论烟消云散。一些对社会理性化情趣难舍的学者,顶着后现代主义者的无情责难,严肃认真地开始了现代化理论的重建。哈贝玛斯的交往理性重建论,吉登斯的双向结构建构论,以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对理性化持肯定态度的新现代化理论,或者说是重建了的现代化理论。

哈贝玛斯坚定地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否定。在他看来,现代化所推进的现代性,即发扬人的主体性,在社会总体联系中寻求社会结构的统一和谐,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推进社会整体进步,这是一项伟大的尚未完成的事业,人类正在为实现它而努力。虽然现代性既遭到贝尔等新保守主义从右的方面的否定,又遭到利奥塔德和德里达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从左的方面进攻,但这并不能导致现代性的消失与现代性的终结。因为,在现代社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并不是作为理性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本身存在的不可挽救的病症,而是现代性尚未充分展开,它的目标和任务还没有实现。在“当代性”法庭上,不是要宣判现代性的死亡,而是要进一步肯定现代性的合法性,扫清现代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障碍。

哈贝玛斯盯住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攻击现代性的焦点——理性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概念和理性事业作了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在洋洋近百万字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玛斯对西方理性观念的实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了详细考察,尤其对韦伯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理性化理论作了深刻而冷静的分析批判。他认为,作为人们推进现代化进程根据的理性,本来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概括出来指向真、善、美三种目标的相互联系的活动准则,在韦伯和帕森斯那里却被划分为认知理性(科学理性)、评价理性(价值理性)、审美理性(艺术理性)三种相互区别的形式。这些主题化了的理性形式在各自发生作用的领域——科学、伦理和美学中,越来越朝着专门化方向发展,以致它们都忘记和脱离了自己的诞生地——日常生活世界,建立了相互隔绝的概念化系统,并站在生活世界之外成为人类生活的异化。

从理性观念分比、隔绝,造成“文化言路断裂”和社会结构分裂这些后果看,理性化的确存在需要调治的问题,但这是现代化进步中的问题,再则如果没有这种分化,理性的功能也不会得到充分发展。哈贝玛斯主张,现在要做的不是终止理性化事业,而是建构一种系统有效的理性图式,为分化了的多种理性观念定位。他认为,理性观念源于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是原初的、尚未分化的理性,分别指向真、善、美的认知、评价和审美三种理性,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分化出来的。因此可以说,生活中的理性是已经分化的理性的基础,是各种文化形式理性的理性。只有理清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中的理性观念,才能为日益分化的文化形式和理性观

念找到重聚与整合的原生地。

受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韦伯等人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与人交往共存的世界，是人们由之出发进入科学世界、宗教伦理世界和艺术审美世界的人类家园。在以交往形式存在的生活世界中，支配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据是尚未分化的交往理性。同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不同，交往理性是既未主题化也未形式化的理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没有确定的目标，一切活动都按习惯或根据当下的兴趣与利益来支配，直接看上去似乎没有原则也没有根据，因此很多人把日常生活看成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其实不然，在这些模糊的习惯、兴趣和利益中，存在着未经反思的一般准则，它们是处于各种特殊条件中的带着各种动机的人们得以交流、沟通、共识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理论虽然无权给生活世界设计或制造出一个理性原则，但是有责任在处于直接性、缺乏反思性的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早已存在的理性结构。通过对日常语言和社会生活的考察，同时吸收了各派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传播学、现象学和社会学的有关成果，哈贝马斯把日常生活中交往行为的理性结构概括为实真、诚恳、适当、可领会。他指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sup>①</sup> 这些普遍的有效性要求是：“言说者必须提供一个真实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适当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sup>②</sup>

从哈贝马斯概括的交往理性结构可以看出，其中不仅包含了认知、评价和审美三种理性形式，而且还增添了强调沟通和理解的可领会性。或者说，交往理性中的真实性，实质是科学理性的原则，即像实证科学那样真实地描述外物的实在性；诚恳性则涉及到交往对方的认同，实质是价值评价和道德认可，因此是伦理学的道德规范问题；适当性关系到交往双方能否保持和谐沟通状态，实质是审美评价和审美体验方面的问题；可领会性是在传统理性观念原有内容中又加上的新内容。受解释学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核心归结为理解，理解作为交往双方的互动行为，必须以语言表达的可领会性为前提，否则沟通就会受阻，理解也就无法达到。

交往理性的这些构成因素在日常交往行为中是作为未分化的结构共同发挥着作用。哈贝马斯从这个方面分析交往理性的结构成份，目的在于说明：在科学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认知理性，在宗教伦理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评价理性，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审美理性，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理性分化出去或主题化出去的，但是当它们回到其出发地——生活世界以后，它们又溶合到一起，成为保持人性完整性的整体理性。在科学和工业生产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现时代，不可能要求科学理性或认知理性再溶入其他理性形式中，也不可能让日益分化的主题化理性形式再汇成一个原初整体，唯一有效的方式是明析这些分化了的理性形式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让它们不断地同交往理性对话沟通，或者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交往理性，不断地在对照中显示主题化的理性观念的缺失与不足。于是，哈贝马斯不仅为各种理性形式明析了它们由之发生的基础，而且也为它们找到了沟通对话的场所和不

①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3页。

断反省自身的参照。

建构交往理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人类行为的深层根据上探索协调人际关系的原则与途径。哈贝马斯反对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但是他建构交往理性又是在为实现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中心任务——处理人际关系而努力。哈贝马斯花费巨大精力长期研究以生活世界为现实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而提出的交往理性论则是为指导人们开展健康、和谐社会交往而做出的深层探索，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重建。

#### 四、未现代化民族的选择

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反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重建，不仅引起了已经现代化各国对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和现代化结果和现代化道路的深入反思，也引起了尚未现代化各民族对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道路的重重困惑。

在人类生活信息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通过电视、微机网络和其它通讯媒介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面对西方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升，以及此起彼伏的新思潮、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未现代化民族也不可能对这些新奇的场景无动于衷。爱护环境、珍惜资源、反对功利主义、克服工业异化、尊重个性、追求和谐、重新审视和估价文化传统、反思现代化利弊得失、寻求人际关系和社团关系协调发展等等，已经逐渐成为未现代化民族先进分子深入思考的课题。

应当承认，未现代化民族的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并未解决。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增加物质生活资料供给仍然是未现代化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但是，今天未现代化民族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同西方国家早期情况相比已经在科技水平、文化氛围、生产环境和生产机制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以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趋于一体化的条件下，未现代化民族要想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物质生产能力，不仅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同先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在外界强力刺激下的本国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集团重组、社会阶级和阶层重新分化等等实质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人际关系在未现代化民族中或在后发展国家中地位也日益提高，仅仅像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那样单纯注重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已经不适宜。

因此，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变化不仅对未现代化民族发生着不可排除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未现代化民族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和社会任务发生变化。尽管德里达、利奥塔德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与主张同未现代化民族的现实生活还有很大距离，但是，他们对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对片面追求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能力提高等方面的批判，还是很值得未现代化民族引为深思的。

现代化或社会发展，都不过是人类在特定思维方式中对自己存在与发展的设计和这种设计的实践。发展的目标、任务、手段、道路、模式和评价尺度，都不过是在特定思维方式中展开的筹划与选择。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思维方式的片面性，而反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根本错误也在于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我们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反后现代主义的冲突中，得到最有意义的启示就是：超越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在人与自然

同人与人两种基本矛盾关系的统一中,反省历史、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依靠科学技术和人文教化,通过生产与交往来实现社会发展的新设计和新选择。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理查·罗蒂:《解构和回避——论德里达》,载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6—406页。
3. 理查·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4. 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载《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Pantheon, 1965.
7. Jacques Derrida; *Coy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opy press 1970.
8. J·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ve Actin*, Heineman, London, 1984.

责任编辑:范广伟

---

## 书 讯

《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报告(1991—1995)》由陆学艺、李培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大32开,平装本,506千字,定价30.00元。欲购者每册加2.50元邮寄费(挂号3.50元),寄至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会学所刘志平收,邮编:100732。国外读者订购每册12美元;港台读者订购每册8美元(均含平邮寄费)。